

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金印国家群的时代

——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

(日)高仓洋彰 著

滕铭予 译 (日)宫本一夫 校

金印国家群の時代
東アジア世界と弥生社会



出版社

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金印国家群的时代

——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

(日)高仓洋彰 著

滕铭予 译 (日)宫本一夫 校

金印国家群の時代
東アジア世界と弥生社会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日)
高仓洋彰著;滕铭予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4

(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ISBN 978-7-5325-9168-8

I.①金… II.①高… ②滕… III.①中日关系—国
际关系史—研究—古代 IV.①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4247号

本书日文原版由日本青木书店于1995年出版

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金印国家群的时代

——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

(日)高仓洋彰 著

滕铭予 译

(日)宫本一夫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1.75 插页 2 字数 211,000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978-7-5325-9168-8

K·2624 定价: 5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本丛书为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12&ZD152）成果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总 序

21 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入和考古学自身发展的需要,2012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次设立了国外著名考古学著作的翻译项目。我们在申报中,原本提出考古学理论与周边邻国考古学两个角度的翻译课题,后经过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的建议,把译著内容集中到周邻国家考古著作,即现在的《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在东北亚考古学方面,我们选译了日本学者高仓洋彰的《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和韩国学者崔梦龙等的《汉江流域史》。日本考古著作是从东亚的视野下研究弥生时代的国际化过程。所谓“金印国家群”是这些被纳入以汉字和汉语为沟通手段的中国统治秩序中的民族的总称。作者从东亚的宏观角度着眼,从九州北部地区的细微研究入手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很有借鉴意义。韩国考古著作构建了朝鲜半岛先史时代的时空框架和文化发展序列。新石器时代朝鲜半岛的圜底筒形罐和“之”字纹装饰为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对比材料。朝鲜半岛青铜时代的标志性器物——琵琶形铜剑,是从中国辽东半岛经鸭绿江下游地区传入的。这些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影响,可以追溯到大连地区年代相当于商代末期的于家村下层文化,年代相当于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商周之际。

在欧亚大陆旧石器研究方面我们翻译了《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Clive Gamble)和《小工具的大思考:全球细石器化的研究》考古论文集(Robert G. Elston 主编)。前者侧重欧亚草原的欧洲部分,在旧石器研究中具有年代标尺的作用。作者还运用了一种新的方法,把来自石器、狩猎与营地遗址的考古证据汇聚起来,用以探讨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活的形式。后者涉及了欧亚草原的亚洲部分,包括细石叶工艺以及相关技术的起源、制作技术和人类对环境的适应等诸多重要的问题。本书的全球视野、运用的石器分析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思路与观点,对于中国细石器考古学研究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性。

在欧亚草原考古方面,我们分别选译了宏观著作《俄罗斯、中亚和蒙古史——内欧亚大陆的史前时代到蒙古帝国》(David Christian)和微观研究的《印度—伊朗人的起源》(Kuzmina, E.),以及一本蒙古考古专著。第一本宏观著作将欧亚大陆分为处于内陆和靠北的内欧亚大陆(Inner Eurasia)与靠海的外欧亚大陆(Outer Eurasia)两部分,前者是游牧和渔猎民族活动的舞台,后者是文化发达的农业文明分布区。该书以宏观的视角系统阐述了内欧亚大陆的历史,认为两地的互动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因,并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研究农业与游牧业的互动。作者提出农牧交错地带为内欧亚大陆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因为这里不仅有农牧社会的军事接触,还有技术、思想、贸易和人群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北方地区在东部草原中的重要作用了。第二本微观研究的著作是作者用50年时间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盟的详尽研究,使我们了解到俄罗斯学者是如何研究一个考古学文化,以及如何结合文化的发展演变与民族学和历史语言学研究考古学文化族属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中国考古资料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学者有责任把自己的发现与研究介绍给世界的学者。蒙古是游牧文明的一个中心,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接壤的重要国家。《蒙古考古》是目前唯一的关于蒙古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的综合性专著,该译著能够使中国学者了解蒙古各时期考古遗存的概况以及蒙古学者的考古研究现状与方法,为从事蒙古考古研究提供最系统的基础性材料。

这套考古学译著有两个特点,一是在资料占有方面重点选择了本土学者的著作,二是我们的翻译团队多是从事东北亚和欧亚草原考古研究的学者,是我们以边疆考古为依托的外国考古学研究的实践。译丛的出版将开启关注邻国考古、注重本土学者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系列考古学著作的翻译与出版,打破英文译著“一统天下”的局面。这套丛书还将有助于把中国考古学放在东亚与欧亚视野下考察,提升我国边疆考古在东北亚与欧亚大陆考古研究中的影响力。在完成项目的这五年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外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有相当数量的考古团队开始赴国外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在这里我们非常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非常有预见性地设立译丛课题,这些译著为了解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以及与中国文化交往提供了大量的物质材料证据,并为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杨建华

2017年6月

中文版序

我很高兴广大的中国读者,能够藉由《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东亚世界与弥生社会》中文版的出版,认识并理解开拓了与中国正式交流的古代日本(倭)人所拥有的智慧和付出的努力,以及古代日本与汉代中国的密切关系。

长期以来,日本向中国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如在奈良时代(8世纪),日本积极推进中国化的进程,仿效中国长安城建设日本平城京;以唐律为基础制定大宝律令;引入中国首都与地方相互连通的驿站制度;仿效“开元通宝”铸造“和同开珎”,开创日本的货币经济制度;编纂《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国史;以唐服为基础制定日本的官服制度等。那时的日本可以说是一个“迷你中国”。

最早的“中国化”始于弥生时代(约公元前4世纪到3世纪初期),以水稻耕作技术的传入为开端。水稻耕作技术虽然是经由更早中国化的朝鲜半岛间接传入日本的,但是在初夏时对水田进行整治、到了秋季在金色的稻田里收获成熟稻谷的场景,则是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世界共同的景观。进行稻作生产和接受米食习俗,就是日本中国化的开始。

稻作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分化,社会出现了阶层,不久阶层演变成阶级,出现了首长阶级。随着西汉昭帝时废除了马弩关制,铁制武器和西汉铜镜等中国物品大量传入日本。首长们不仅佩带着从中国输入的铁制武器,将琉璃璧、西汉铜镜等作为其权威的象征,他们还进一步认识到不学习汉字和汉文就无法与中国进行交流,于是派遣使者到中国学习汉字和汉文。随着与中国的交流日渐繁盛,首长们最终接受了汉王朝所授予的如“汉委奴国王”金印之类的印绶而成为其麾下的一员,而汉王朝则通过印绶的授予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汉为宗主国的册封体制。这就是本书所说的“金印国家群”。

弥生时代约600年,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各约200年,基本上与中国的战国、西汉和东汉时期相对应。弥生时代正是受到了中国的影响划分为三期,并成为后来奈良时代全面中国化的先驱。

在此之前的绳纹时代,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就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中国

文化经由朝鲜半岛间接传入了日本。由于当时的日本视野所及和对海外世界的认识仅限于朝鲜半岛,因此在接受水稻耕作技术体系和铁制农具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些都源于隔着朝鲜半岛、与日本并不相邻的中国,但实际上日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惠泽。

到了弥生时代中期,日本与西汉之间开始有了直接的交流,这也促成了日本急速的变化与发展。虽然目前尚无资料可以证明,但是很可能在西汉的朝廷上,日本使者会有使用流畅的汉语与来自中亚及东南亚的使者进行对话的机会,或者说至少当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日本的视野也由此从朝鲜半岛扩展至东亚,由东亚扩展到所有的金印国家群。这使我们不禁联想到派出遣唐使去学习、吸收唐代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奈良时代,以及积极吸取欧美知识而尝试近代化的明治维新时代。

长期以来,日本不断地、积极地吸取先进文化,从而带来自身的发展变化,本书所描述的就是日本开始吸取先进文化时的原始风貌,以及中国文化对日本社会发展的促进和影响。期待中国的读者通过本书可以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最初原点有所认识与理解。

原书刊行于1995年,其后虽然也有若干资料上的补充,但是并没有更改本书的论点。中文版的刊行由吉林大学滕铭予教授进行了恰切的翻译而得以实现。滕教授修正了一些原书的误字、脱字问题,并多次与作者商榷书中较难理解的地方和引用文献的内容,完成了较日语原版更为精确的中文版本。

谨对滕铭予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高仓洋彰

2018年1月24日

(中文译者:金绳初美)

致 读 者

金印国家群……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金印国家群”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由于日本出土了“汉委奴国王”金印,以及卑弥呼受赐得到了“亲魏倭王”的金印,所以大家还是知道“金印”的含义。

在古代中国,尤其是从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朝,非常流行赐印。印通常使用金、银、铜等不同的材质制作,上有龟纽、骆驼纽,或者是蛇纽,印面所刻文字也有“玺”、“印”、“章”等差别,这些都用于区别使用者的身份。从奴国王和卑弥呼,以及难升米等使节受赐于中国王朝的印来看,有“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等,表现的则全部是官职,即中国王朝通常根据受赐一方地位的高低而授予受赐者不同的官职。

古代的东亚地区,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 403—前 221 年)开始了一体化的进程,最后由秦始皇结束了列国分立的战国时代,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秦始皇的统一虽然是汉民族的大业,但是在这个统一过程中,汉民族与其他民族产生了各种冲突,那些被迫离开土地的民族,还有那些战败的汉人,开始向中国以外的地区迁徙。虽然这是很悲惨的事情,但是换一个角度看,战争和流民的迁徙,则有效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向周边地区的传播。

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也不例外。日本列岛虽然也有自身传统的绳纹文化^①,但是随着中国文化的扩张,从事水稻种植的农耕文化传入日本列岛。尽管这是间接的影响,但是日本列岛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其结果就是产生了弥生文化。这是日本列岛体验到的最初的文明开化。

以汉武帝为代表的汉代的中国,大力推行领土扩张政策,他们不断地将中国

^① 日本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因当时使用的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而得名,所以日本的新石器时代也称为绳纹时代。其年代大体上始于距今 13 000 年,下限因地区而稍有不同,大体在公元前 3 世纪或稍后。根据绳纹陶器的演变,可分为草创、早、前、中、后、晚六期。除了时期不同以外,绳纹文化又有显著的地区性差异,可分为许多不同的类型。本书页下注均为译者所加,特此说明。

文化传播到周边的民族和地区,从而推进了东亚地区中国化的急速发展。

为了能够尽快接受新的文化和新的制度,与间接的交流相比,显然还是直接与中国产生交往最为有效。于是,中国向周边地区扩张的意图就和那些希望直接与中国发生交往的周边民族的愿望完美地达成一致。倭也不例外。倭依岁时而派遣代表奴国王和卑弥呼的使节到汉王朝去,不仅意味着承认汉的权威,显然也带有经济和文化的目的。

与中国的频繁交流,使得周边地区的民族与社会也不断成熟,孕育出了国和王,而中国方面则或以武力,或打着友好的旗号,将周边民族纳入其统治的麾下。像倭和韩这种没有被纳入其直接统治之下的民族,中国也将其王与高官作为外臣纳入自身的统治秩序之中,通过官僚体制将其与汉王朝联结起来,这就是下赐给这些外臣包括金印在内的各种不同的印。这些印就是东亚世界一体化的证据,以这些印为核心而诞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联合体就是金印国家群。

金印国家群,也可以说是那些被纳入以使用汉字、汉语为沟通手段的中国统治秩序中的民族的总称,他们在保持自身文化的同时,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了共同拥有中国文化,即出现了现在所说的国际文化。现在的世界已进入一个更加国际化的时代,而我们的祖先开始体验国际化就是在弥生时代,即金印国家群的时代。下面,我们将在本书中追溯弥生时代先民所走过的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目 录

《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总序	1
中文版序	1
致读者	1
 绪论 弥生时代的国际化	1
一、不同文化的交流	1
二、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弥生时代的分期	2
 第一章 接受水稻耕作技术体系	7
第一节 稻作的传播之路	7
一、水稻耕作体系的传播路线	7
二、最初接受稻作地点的相关资料	9
三、接受地所表明的稻作传播路线	14
第二节 从渔民型的交流到农民型的交流	15
一、接受稻作之前的稻米资料	15
二、朝鲜半岛的稻米资料	17
三、绳纹时代的对外交流	19
四、支石墓的分布	22
第三节 新生活,新技术	26
一、环濠聚落的传入	26
二、新型村落的出现	28
三、出现了完备的水田	30
四、稻作使用的工具	31

五、稻作的普及	33
第四节 阶层社会的诞生	36
一、接受稻作期到弥生时代前期的两种环濠	36
二、出现环濠聚落的意义	38
第二章 地域社会的确立和统治者的出现	44
第一节 武器与装饰品	44
一、翡翠制的项链	44
二、朝鲜半岛南部的青铜器文化	47
三、有选择地接受朝鲜青铜器文化	50
第二节 地域社会的统一及其背景	51
一、地域性的明显化	51
二、地域性社会的产生	54
三、古国(クニ)的单位	58
第三节 统治者的出现	59
一、早良的王(才ウ)	59
二、神埼的王(才ウ)	64
第三章 倭的国、王与汉王朝	66
第一节 与汉之间直接交流的开始	66
一、西汉武帝的领土扩张政策	66
二、乐浪郡的设置	67
三、韩所见到的汉文化影响	70
四、中国史书中出现的倭之国与王	72
第二节 西汉铜镜所展现的国与王	76
一、出土西汉铜镜的遗址所具有的优越性	76
二、用于随葬的西汉铜镜	79
三、铜镜的权威及其渊源	88
第三节 伊都国王和奴国王	89
一、伊都国王的墓	89

二、伊都国王的论证	91
三、奴国和奴国王	95
第四章 成为金印国家群的一员	99
第一节 蛇纽印的世界	99
一、关于“汉委奴国王”金印	99
二、蛇纽印的背景	101
三、汉的印制与蛇纽印	102
四、使用蛇纽印的主体	107
第二节 下赐“汉委奴国王”金印的意义	108
一、弥生人与文字	108
二、茶户里遗址出土的笔	111
三、对文字资料的期待	113
第三节 从汉镜的传播看东亚地区的一体化	115
一、汉的铜镜	115
二、乐浪的铜镜	117
三、韩(原三国时代)的铜镜	118
四、倭(弥生时代)的铜镜	121
五、汉镜与倭人	125
第五章 倭国的诞生	128
第一节 倭国的成熟	128
一、世世有王	128
二、倭人传中的诸国	131
三、从奴国到倭国	137
第二节 王的宅邸	139
一、方形环濠的出现	139
二、大型地面建筑的性质	144
三、宅邸的可能性	147
第三节 倭人传的世界	150

一、魏倭外交的目的	150
二、倭国使者的装束	152
三、韩之动向	155
四、原始国家的诞生	159
 终篇 面向东亚世界的视点	163
一、视点的不足	163
二、新的视点	164
 插图出处	168
后记	171
译后记	173

绪论 弥生时代的国际化

一、不同文化的交流

在日本古代已有传自中国的被称为伎乐的假面乐舞,表演者戴着面具以表现不同的人物,其中常会出现鸢鼻红颜的王者——“醉胡王”和嬉笑怒骂的八个侍从——“醉胡从”在醉意中嬉闹的滑稽场景。这些面容可怖的胡人(很可能是来自西域的高目深鼻、碧眼多须的波斯人)醉眼朦胧胡闹的样子虽然很有趣,但从中也可窥见当时中国人对胡人的畏惧之感。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见到这种对于不曾见过的异域民族和文化的困惑与误解。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真正接触到外来文化是在弥生时代,但是最初的邂逅是怎样的,我对此深感兴趣。我们的祖先渡过大海,和朝鲜半岛、中国大陆的人们进行着怎样的交流,或是我们的祖先怎样去面对渡海而来的异域人群,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总的来说,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因地域、立场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弥生时代的日本列岛,稻作农耕文化是其所具有的共性,不过若仔细观察各地具体的文化内涵,就会发现不同之处。如青铜器文化,朝鲜半岛南部和九州北部地区应该属于环对马文化圈,由于这一文化圈内交流频繁,且具有深厚的共同基础,其所具有的文化上的共性远远超越了同关西和关东的弥生文化之间所具有的共性,从而处于环对马文化圈中的这两个地区彼此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因此,对于九州北部地区来说,所谓的异域,应该是位于其东方的地方。可是在《汉书》等中国的史书中,却把朝鲜半岛南部称为韩,把对马以东的日本列岛称为倭,表现出很严格的区分。显然,除了交流的频繁程度、认同感以外,当时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将韩和倭区分为不同的异域。

现在世界各地的变化日趋同步,体验外来文化、到其他地区进行交流的机会也日益增加,只是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很久远的事情。江户时代末年的1860年(万延元年),日本派出丰前国地方长官新见正兴一行,为了日美通商条约批准

书的换文事宜来到美国,当他在博物馆里见到日本的农具和在 1856 年担任首届美国驻日本总领事的顿赛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捐赠给博物馆的日本服装,以及他在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看到各种各样有关日本的资料,还有 1853 年率领美国舰队抵达浦贺港的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捐赠的物品时,感到非常惊讶^[1]。从哈里斯和佩里在返美后的数年里一直将带回的日本物品进行展览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异域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新鲜感。不过时至今日,无论是去往美国,还是从美国来到日本,都不会再有这种对于异域文化的大惊小怪了。

现在,距江户时代充其量只不过是过去了 130 年,可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却几乎没有留下江户时代的印迹。不过若向前追溯三四十年,还是保留着很多当时生活的痕迹。我在福冈市市中心度过了小学时代,那时家家都还使用炉灶,一到傍晚,从城里家家户户的门里就会升起袅袅的炊烟。在我的故乡,无论是夏天还是冬日,大家经常围在地炉旁,一边吃饭一边唠着家常。现在这些炉灶、地炉之类的日用物品在生活中都已经不再使用,虽然在历史民俗资料馆里还可以见到,也只不过是一种新鲜、奇妙的体验而已。这或许也可以称为不同文化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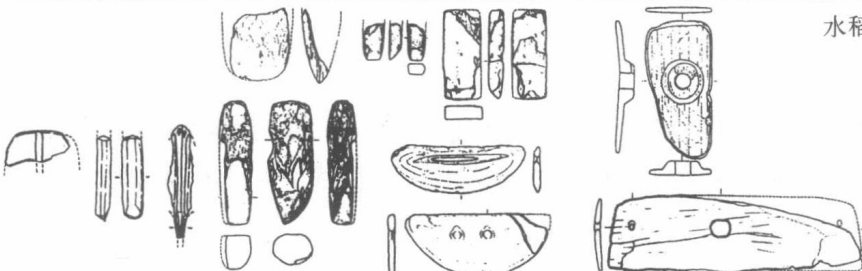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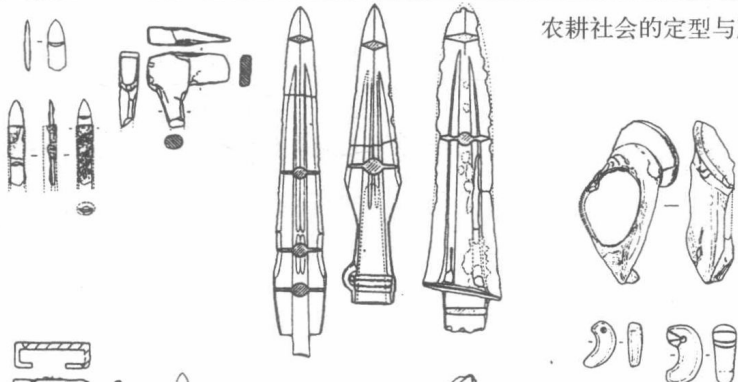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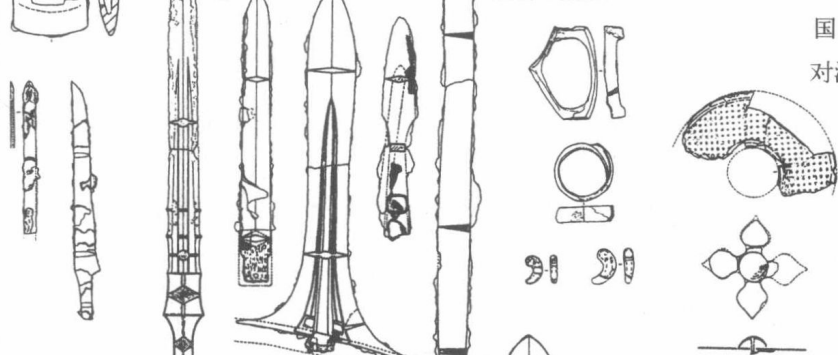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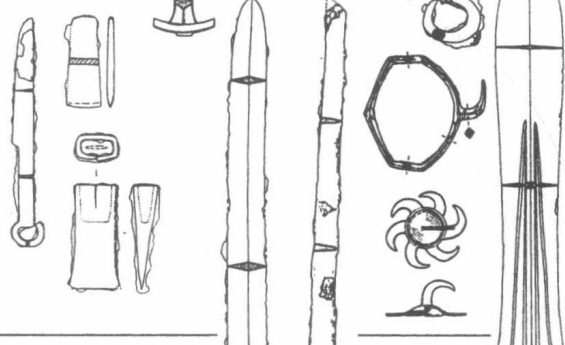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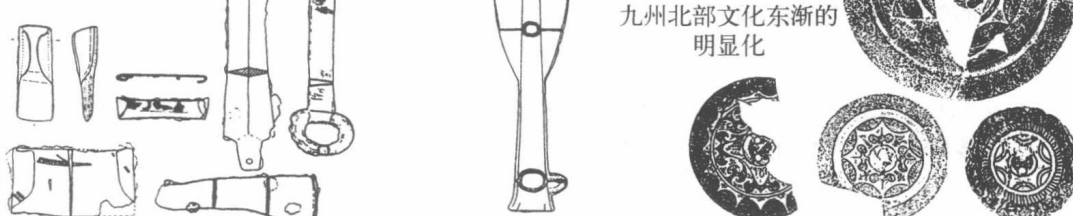
1960 年,当我还是高中生时,在小仓市(现北九州市的小仓北区和小仓南区)召开的“新兴的北九州小仓大博览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彩色电视机的出现,当时满怀期待,憧憬着有一天能在家里看到彩色电视,可现在已经记不起是在什么时候,这个愿望很快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现实。

可以说,一直到 1960 年前后,在日本的生活中还保留着江户时代的生活场景,那也是弥生时代的继续。如果说现代生活中还保留着弥生时代的遗痕,可能不会有人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本书将要说明的就是弥生时代留下的子遗绝不是不同的文化。

二、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弥生时代的分期

自古以来,九州北部地区作为接受中国文化和朝鲜半岛文化的门户,发挥着记录日本文明化进程的重要历史作用。弥生时代则是使这个作用突显出来的时代。

从出土遗物的变化来看九州北部地区的发展(图一),可以观察到在发生划时代变化的时期一定都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影响。如图一所示,九州北部地区的弥生时代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2]。其第一阶段的确立,是由于水稻耕作技术体

400年 绳纹末—弥生初	 水稻耕作的传播
前期末—中期前半	 农耕社会的定型与原始“国”、“王”的出现 九州北部文化的扩散
中期后半 B.C.	 国、王的确立 对汉交流的日渐活跃
A.D. 后期初—前半	 进入东亚世界
后期后半—末 250年	 九州北部文化东渐的明显化

图一 九州北部弥生文化的变迁所见外来文化影响